

# 土著话语与非洲民族国家建构

——以科特迪瓦危机为例\*

李鹏涛

**内容提要** 科特迪瓦危机的关键在于公民身份问题。博瓦尼执政时期刻意淡化公民身份问题以吸纳外来移民，从而使得科特迪瓦长期保持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然而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的衰退、多党制的实行，执政者为巩固自身统治提出了“科特迪瓦性”概念，其基本含义是“科特迪瓦人的科特迪瓦”，而实际目标是排斥北方人。“科特迪瓦性”自诞生之日起就对科特迪瓦社会各领域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因而成为科特迪瓦政治中的核心问题，并最终导致2002年内战全面爆发、南北分裂局面的形成。类似的土著话语也出现在其他非洲国家，折射出非洲民族国家建构进程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关键词** 非洲政治 民族国家建构 科特迪瓦 土著话语

**作者简介** 李鹏涛，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副研究员（金华321004）。

以往关于非洲民族主义的研究多关注其积极作用，然而非洲民族国家发展进程表明，非洲民族主义不仅有包容性，而且也有排外的一面，这在发生政治或经济危机的非洲国家表现尤为明显，例如近年来的科特迪瓦危机。科特迪瓦一度被视作“西非经济橱窗”，但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衰退与政治动荡，并于2002年陷入全面内战，战事虽于2004年结束，

---

\* 本研究受到浙江省“之江青年社科学者行动计划”资助。论文写作过程中得到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研究生科特迪瓦籍杰西（Tano Kuassi Joseph）的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但导致南北分裂局面形成,而在2010年科特迪瓦总统选举中更是出现了“一国两总统”的政治僵局。近年来的科特迪瓦危机,其核心在于“科特迪瓦性”(Ivoirité)<sup>①</sup>这一具有分裂性的公民身份概念。“科特迪瓦性”,简单概括就是“科特迪瓦人的科特迪瓦”(Côte d'Ivoire to Ivorians),它试图区分“本土科特迪瓦人”和“有着移民祖先的科特迪瓦人”。类似的“土著话语”(autochthony discourse)也出现在很多非洲国家,并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严重冲击,由此折射出非洲民族国家构建进程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本文试图通过对科特迪瓦危机形成过程的历史分析,以理解“科特迪瓦性”及类似的土著话语对于非洲民族国家建构的意义与影响。<sup>②</sup>

## “种族政治学”与科特迪瓦种植园经济的兴起

科特迪瓦有60多个族群,分为阿肯(Akan)、克鲁(Krou)、南曼迪(Southern Mandé)、北曼迪(Northern Mandé)和沃尔特(Gur)等族系,大致可以划分为穆斯林主导的北方和基督教徒控制的南方。科特迪瓦在19世纪末逐渐沦为法国殖民地,当时被称作“象牙海岸”。从20世纪20年代起,殖民当局开始大力发展可可种植园经济。

法属西非(Afrique Occidentale Française)总督威廉·庞蒂(William Ponty, 1908~1915年任职)大肆鼓吹“种族政治学”(Politique des races),其目的是通过切断对于主导“种族”的依赖来实现“各种族”自治,以免彼此文化混杂影响到各自“特性”,从而实现有效的殖民统治管理。德拉福斯(Maurice Delafosse)等殖民官员和学者还据此开展“民族志”调查工作,他们依据自己所搜集的数据对当地社会进行分类,并且故意忽略前殖民时代邻

---

① 关于“Ivoirité”的中文翻译,以往多将其译作“科特迪瓦化”,但按其含义来说,主要是指科特迪瓦土著人口的性质或特征,相当于“Ivorianness”,因此本文将译作“科特迪瓦性”,这同时也是为了区别于20世纪70年代以后科特迪瓦出现的“科特迪瓦化”(Ivoirisation)运动。

② 学界较多关注民族或族群问题对于非洲民族国家建构的影响。近年来,非洲本土和欧美学者开始关注土著话语问题,它与民族或族群问题既有相通性,同时也存在着明显差异。大量研究成果相继出现,一些重要的非洲研究专业刊物也陆续刊发研究特刊来关注这一问题。See “Special Issue: Autochthony and the Crisis of Citizenship”, *African Studies Review*, Vol. 49, No. 2, 2006; “Special Issue: New Nationalism and Xenophobia in Africa”, *African Spectrum*, Vol. 44, No. 1, 2009; “Special Issue: African Spaces of Exclusion”, *Africa Today*, Vol. 56, No. 3, 2010; “Special Issue: Xenophobia and Civil Society”, *Politikon*, Vol. 38, No. 1, 2011.

近群体间的政治和经济联系。

遵循这一理念，殖民当局对于科特迪瓦各地区按照功能和族群特性来实施管理统治。首先，经济繁荣、适合从事可可和咖啡种植的东南部地区，曾与几内亚湾的欧洲贸易有着密切联系，在这里居于主导地位的阿肯族酋长们被视作潜在的企业家和种植园主；其次，北部地区适合种植咖啡，不适宜种植可可。这里的塞努福人（Senufo）被殖民当局视作温顺而适合从事农业生产，应为南部种植园输送劳动力。曼迪族系中的部分曼丁哥人（Malinké）皈依伊斯兰教，被称作“迪乌拉人”（Dyula），他们的贸易网络覆盖了前殖民时代西非大部分地区。迪乌拉人是法国和欧洲商品早期进入当地市场的代理人，同时也是殖民者和反抗者之间的调停人；最后，西部地区是这一等级秩序的最底层，居住着贝德族（Bété）和克鲁族，这里有着适合种植园经济的广袤土地。殖民当局的这种人为的类型划分成为了“自我实现的预言”，对于科特迪瓦社会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sup>①</sup>

在地广人稀的象牙海岸殖民地，殖民者对于经济的控制是通过垄断劳动力来实现的。由于地广人稀，而欧洲殖民者只有数千名，因此他们满足于自己所控制的香蕉、咖啡和可可种植园，而并未试图垄断土地。法国殖民政府尽管声称是所有“空置或无主土地”的拥有者，但却默认了传统土地所有权，尊重当地精英对于土地冲突的调解权。因此，殖民者并未将土地视作有限资源，也未挑起与本地人口的严重冲突。相形之下，控制劳动力对于殖民者的种植园以及殖民政府的公共项目而言是极为重要的，殖民政府于1930年起实施“强制劳动法”，规定禁止非洲种植园主直接雇佣劳动力，只有在欧洲殖民者和殖民政府的劳动力配额完成后，才轮到他们雇佣劳动力。随着可可种植园经济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扩张，劳动力成为非洲人和殖民当局冲突的首要原因。<sup>②</sup>在这一背景下，费利克斯·乌弗埃-博瓦尼（Félix Houphouët - Boigny）创建了非洲人农业公会（Syndicat Agricole Africain），它代表巴莱族（Baule）咖啡和可可种植园主利益，主要诉求是修改歧视非洲种植园主的强制劳动法。

<sup>①</sup> Armando Cutolo, "Modernity, Autochthony and the Ivorian Nation: the End of A Century in Côte d'Ivoire", *Africa*, Vol. 80, No. 4, 2010, p. 529.

<sup>②</sup> A. R. Zolberg, *One - Party Government in the Ivory Coas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4, pp. 19 - 20.

二战后,劳动力匮乏局面更趋严重。1946年,博瓦尼将非洲人农业公会改组为科特迪瓦民主党(Parti Démocratique de Côte d'Ivoire),将斗争矛头直指偏袒法国种植园主的强迫劳动制度。在博瓦尼的努力下,法国国民议会于1946年4月废除了海外领地强迫劳动法规,从而为20世纪50年代科特迪瓦可可经济繁荣奠定了基础。“可可繁荣”始自东南部地区,随着老可可树产量下降以及过度开垦森林土地的压力增大而逐渐向中西部和西南部地区推进,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可开垦林地消耗殆尽而宣告结束。这一过程中,科特迪瓦北部的曼丁哥人、宝莱人以及上沃尔特(1961年后改名为“布基纳法索”)、马里和加纳等邻国大量涌入的移民为科特迪瓦的经济繁荣奠定基础,科特迪瓦成为了当时法属西非的经济中心。

法国殖民统治政策对于独立后的国家建构的历史影响表现为:一方面导致殖民地社会地区差异的相对固化,从而为民族国家内部消弥分歧、实现整合带来巨大困难;另一方面,法国殖民者同时积极鼓励整个法属西非地区内部的劳动力流动,导致“土著”与“外来”人口的对立以及二者在土地所有权和政治利益上的激烈斗争,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阿格尼人(Agni)创建的“保护科特迪瓦土著利益协会”(Association of Defence of Autochthons Interests of Côte d'Ivoire, ADIACI),它就滥用塞内加尔人和达荷美(现在的贝宁)人担任殖民地管理阶层职务而向法国殖民者抗议,同时也抱怨宝莱人和迪乌拉人同他们争夺土地。<sup>①</sup>法国殖民统治政策开启了固化与流动的双重复杂进程,是土著话语产生的重要历史背景。

## 博瓦尼的模糊政策与“科特迪瓦奇迹”

1960年科特迪瓦独立后,博瓦尼一直担任总统直至1993年病逝。在这30余年时间里,博瓦尼构建起了以种植园经济为基础的政治体系,与前殖民宗主国法国、种植园主以及大量移民劳工的结盟关系构成了这一政治体系的关键。首先,在对外关系方面,博瓦尼选择继续维持并增强与法国在军事、经济、政治和文化事务上的特殊关系。经济命脉继续控制在法国手中,法国在

---

<sup>①</sup> R Marshall - Fratani, “The War of ‘Who is Who’ Autochthony, Nationalism, and Citizenship in the Ivoirian Crisis”, *African Studies Review*, Vol. 49, No. 2, 2006, p. 15.

科特迪瓦存在之深之广，甚至超过了殖民时期。独立时，居住在科特迪瓦的法国人有1万人，后来陆续增加到了5万人，堪称法国本土以外最大的法国人聚居地之一。<sup>①</sup>大量的法国人继续供职于科特迪瓦政府部门，法国常备军“独角兽部队”仍驻扎在阿比让，有学者甚至认为，“如果说有一个国家，其独立不过是换一面国旗，这个国家就是科特迪瓦”<sup>②</sup>；其次，对于种植园主，博瓦尼政府的口号是“耕者有其田”（land belongs to those who make it produce），这种灵活方式导致对于土地的强烈需求动力，激发了土地开拓运动；再者，对于广大的外来移民，博瓦尼秉持泛非主义思想，实行吸引外来移民的政策，鼓励外来移民通过他们的辛勤劳作作为这个资源丰富的国家贡献力量。来自布基纳法索、几内亚、马里、尼日尔和尼日利亚等国的大规模移民被吸引到科特迪瓦，外国人占到科特迪瓦总人口的26.03%。与此同时，科特迪瓦的内部劳动力也实现了大规模流动，北部的曼丁格人来到南部，为可可、咖啡、香蕉和菠萝种植园提供了大量劳动力。<sup>③</sup>

直至20世纪80年代，博瓦尼政府同可可生产者、国内不同族群以及外来移民维持着良性互动关系，从可可和咖啡出口中所获得的巨额税收使得博瓦尼政府能够有效消除社会内部不同阶层以及各地区之间的紧张关系，通过恩庇关系（patron - client relationship）的利益分配机制来巩固自身地位，并且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和农业生产，科特迪瓦因此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成为西非经济强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一直维持在年均7%，与周边国家当时所遭遇的严重社会政治或者经济局势形成鲜明对比。<sup>④</sup>博瓦尼所创立的这一政治经济体系被称作“乌弗埃主义”（Houphouëtism），它是世袭主义（Patrimonialism）、外向性（Extraversion）和家长主义（Paternalism）等的混合产物。博瓦尼清楚外来移民和北方劳动力是“科特迪瓦奇迹”的重要支柱，因此给予其较高社会地位，故意推行一种含混的公民身份政策，默许移民参与科特迪瓦政治，

① [英国] 马丁·梅雷迪斯著；亚明译：《非洲国：五十年独立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年版，第201页。

② Richard Banégas, “Côte d’Ivoire: Patriotism, Ethnonationalism and other African Modes of Self-writing”, *Africa Affairs*, Vol. 105, No. 421, 2006, p. 548.

③ Armando Cutolo, *op. cit.*, p. 529.

④ 尤其是邻国加纳在恩克鲁玛治下所推行的计划经济模式遭遇惨败，加纳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20世纪60年代逐年下滑，恩克鲁玛政府也于1966年被推翻。See Daniel Chirot, “The Debacle in Côte d’Ivoire”,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7, No. 2, April 2006, p. 64.

并模糊科特迪瓦人与非科特迪瓦人之间的界限。

博瓦尼所奉行的自由土地政策，其实际效果是鼓励外国和国内移民，而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加剧了土地所有权竞争。在移民人口较多的西南地区形成了一种“监护人制度”（Tutorat）来规范土著居民与移民之间的恩庇关系。土著居民认为任何人都都有权利获得维持生计的土地，只要这些“好的陌生人”愿意接受当地社会赋予的责任，并遵守当地的社会经济秩序，土著居民就不能拒绝给予他们土地。而作为回报，移民为当地社会提供劳动力和钱财。由于土地资源较为宽裕，因而双方在很长时期内一直维持着较为融洽的关系。<sup>①</sup>但是随着可开垦土地的逐年递减，“土著”与“外来”的对立已经成为政治辩论中的经常性话题，博瓦尼政府被迫推行“科特迪瓦化运动”（Ivoirisation），专门成立了“劳动与科特迪瓦人”部（Ministry ‘du Travail et de l’Ivoirisation），赋予“土著”科特迪瓦人在教育、社会住房、学生奖学金和住宿方面的“国民优先”法规。不过，这时的“科特迪瓦化运动”仍是以较为温和的方式进行的。

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科特迪瓦开始面临严重的社会和经济危机。可可繁荣达到结构性极限，过去 20 年时间里大约 1 000 万公顷森林被砍伐，可开垦的林地变得稀少，国际市场可可价格暴跌致使政府和种植园主收入锐减。<sup>②</sup>雪上加霜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迫使科特迪瓦执行严厉的结构调整政策，农产品统购办公室（Caisse de stabilisation des produits agricoles）被废除，咖啡和可可生产领域被迫对国际竞争开放。<sup>③</sup>此前通过新世袭主义约束政治分歧的机制被摧毁，作为博瓦尼政权基础的宝莱族种植园主和城市中等阶层面临危机，以种植园经济为支柱的“科特迪瓦奇迹”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在博瓦尼长达 30 余年的统治时期，外来移民在科特迪瓦享有同样的公民权利，他们享有选举权，可以购置地产，获得政府职位。在科特迪瓦这样有着不同宗教群体、移民人口占全国人口四分之一左右的多族群社会，这种具有流动性的民族认同和公民身份概念是有益的，它为科特迪瓦经济发展带来

---

① Jean - Philippe Colin, Georges Kouamé & Débégoun Sorom, “Outside the Autochthon - Migrant Configuration: Access to Land, Land Conflicts and Inter - Ethnic Relationships in a Former Pioneer Area of Lower Côte d’Ivoire”,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Vol. 45, No. 1, 2007, pp. 33 - 59.

② Dwayne Woods, “The Tragedy of the Cocoa pod: Rent - seeking, Land and Ethnic Conflict in Ivory Coast”,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Vol. 41, No. 4, 2003, p. 648.

③ Richard Banégas, op. cit., p. 539.

生机与活力。但与此同时，“谁是科特迪瓦人？”这一民族国家建构进程中的核心问题被长期忽视，博瓦尼 30 余年执政期间并未直接面对这一问题，而是故意采取模糊含混的政策，这在促进经济发展需要的同时，也为以后发展埋下隐患。

## “科特迪瓦性”与科特迪瓦危机

1990 年，迫于内外压力，博瓦尼同意开放党禁，举行多党选举，并且击败了巴博（Laurent Gbagbo）所领导的科特迪瓦人民阵线（Front Populaire Ivoirien）而赢得大选。1993 年博瓦尼去世后，继承问题出现了严重分歧，时任议长的贝迪埃（Henri Konan Bédié）继任总统，但面临着竞争对手瓦塔拉（Alassane Dramane Ouattara）的严峻挑战。在 1995 年大选前夕，瓦塔拉离开科特迪瓦民主党，成为共和人士联盟（Rassemblement Des Républicains）推出的总统候选人。

此时，结构调整政策、市场自由化以及可可价格暴跌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博瓦尼所创立的新世袭主义权力体系根基遭受严重削弱，科特迪瓦人开始争夺此前留给外国移民的经济资源，各路政客更是纷纷鼓噪“外来人问题”的严重性，在他们的宣传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外国人占到总人口的 1/4 以上，这使科特迪瓦土著人口面临着经济、人口和“文化”上被剥夺的危险，甚至对于国家主权也造成严重的政治威胁。在贝迪埃总统任内，穆斯林北方和基督教南方之间的分歧进一步扩大，针对移民劳工的攻击事件日益增多。

在这一背景下，贝迪埃为了巩固权力而抛出了颇受争议的“科特迪瓦性”概念。它不仅成为了打击贝迪埃主要竞争对手瓦塔拉的政治藉口，而且也回应了来自巴博的挑战，因为巴博早在 1990 年大选中既已提出了剥夺“外国人”投票权，贝迪埃只是“剽窃”了巴博的动员策略。<sup>①</sup>“科特迪瓦性”含义可以概括为“科特迪瓦人的科特迪瓦”，主要基于区分“本土科特迪瓦人”和“有着移民祖先的科特迪瓦人”，从而将他们等同于布基纳法索移民，暗示他们也是外国人，或者最多只能算祖先是外来移民的科特迪瓦人，这其中掺

---

<sup>①</sup> Guro Almås, “The 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Economic Adjustment Crisis, Reform and Political Breakdown in Côte d’Ivoire”, in Cyril I. Obi ed., *Perspectives on Côte d’Ivoire: Between Political Breakdown and Post - Conflict Peace*, Discussion Paper No. 39, Nordiska Afrikainstitutet, Uppsala 2007, p. 16.

杂着仇外和仇视北方人的情绪。“科特迪瓦性”是通过选举改革和公民身份政策而实现制度化的，它实际上否认了非“本土科特迪瓦人”的公民权。<sup>①</sup>一些文人还组织起了“贝迪埃思想高校宣传组织”<sup>②</sup>来宣扬“科特迪瓦性”，他们的观点大致可以概括为：“科特迪瓦性”高度概括了科特迪瓦人从衣着、饮食到音乐和语言在内的文化特性；科特迪瓦人有着数百年的历史，因此真正的科特迪瓦人能够在科特迪瓦境内找到自己出生地；归化者虽然被认为是科特迪瓦人，但并不能算作“真正的”科特迪瓦人。<sup>③</sup>

“科特迪瓦性”概念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成为了科特迪瓦政治中的核心问题，科特迪瓦社会的“潘多拉魔盒”由此被打开。<sup>④</sup>1994年，贝迪埃通过自己控制的国民议会制定法律，规定总统和立法机构候选人必须证明自己及其父母出生原籍是科特迪瓦。1995年大选遭到瓦塔拉领导的共和人士联盟和巴博的科特迪瓦人民阵线的联合抵制，贝迪埃虽获胜，但其合法性遭质疑，这使得巴博和瓦塔拉声望日隆。值得注意的是，共和人士联盟也在操纵利用“科特迪瓦性”话语来博得北方民众支持，在他们的宣传中，瓦塔拉之所以被排斥在政治之外，是因为他是一个北方人和穆斯林。

1999年12月，盖伊（Robert Guéi）发动政变推翻了贝迪埃，声称要彻底清除“科特迪瓦性”话语的政治毒害，这是科特迪瓦历史上的首次政变。然而，为了能够维持权力，盖伊在上台后迅速转变态度，为了确保能够在2010年10月总统选举中获胜，盖伊继续运用“科特迪瓦性”话语来剥夺瓦塔拉的参选资格。瓦塔拉和巴博联合抵制选举结果以示抗议，而盖伊中断了选票统计，并解散了选举委员会，宣布自己当选总统。巴博支持者发动大规模街头抗议活动，迫使盖伊下台，巴博成为总统。

此后，瓦塔拉要求根据包容性公民身份原则（Inclusive Citizenship）重新举行大选，不得剥夺北方人选举权。而巴博将自己视作“土著居民”利益代言人，继续坚持“科特迪瓦性”概念，暗示瓦塔拉并非土生土长的科特迪瓦

---

① Abu Bakarr Bah, “Democracy and Civil War: Citizenship and Peacemaking in Côte d’Ivoire”, *African Affairs*, Vol. 109, No. 437, 2010, p. 604.

② 法语名称为“Cellule Universitaire pour la Défense et la Promotion des Idées du Président Henri Konan Bédié”，简称“CURDIPHE”。

③ Henri - Michel Yéré, “Reconfiguring Nationhood in Côte d’Ivoire?”, in Cyril I. Obi ed., *op. cit.*, p. 60.

④ R Marshall - Fratani, *op. cit.*, p. 31.



人，因而没有资格竞选总统。<sup>①</sup> 2000年修订后的科特迪瓦宪法明确规定，总统候选人“出生地必须在科特迪瓦，其父母也必须出生在科特迪瓦。候选人必须未曾放弃过科特迪瓦国籍，也不能拥有其他国籍。候选人在选举前五年里必须不间断地居住在科特迪瓦，其在科特迪瓦居住时间不能少于十年。”这些法律条款实际上就是为北方政治领导人瓦塔拉“量身定做”的，瓦塔拉父亲被认为来自布基纳法索，据称他曾持有布基纳法索护照，而且瓦塔拉在早年学生时代以及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西非国家中央银行官员任职时期曾长期居于国外。<sup>②</sup>

“科特迪瓦性”概念并不单纯是一种选举策略，更涉及国籍认定、土地分配以及公职任命政策等重大问题，对于北部地区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科特迪瓦性”概念的结果，北方人不仅感到自身在政治上被边缘化了，而且认为他们自己是政府所主导的公民身份歧视的受害者。根据2001年巴博政府认定的政策，“任何申请身份证件者，必须持有出生地所在村庄委员会的出生地证明，以证明自己的国籍。”<sup>③</sup> 然而，由于北部地区较为活跃的人口流动，再加上殖民时期和博瓦尼时代宽泛的身份界定，这一政策事实上很难付诸实施，大量的北方人因为无法证明父母的科特迪瓦人身份而被剥夺科特迪瓦国籍。

巴博继任后试图将北方人从军队、警察和公职中清除出去，并代之以自己的支持者，“科特迪瓦性”话语的危害日益显露。“科特迪瓦性”所造成的恶果是，群体内部紧张关系本质上已经发生变化，土地和经济争端被赋予政治和文化含义，南北仇视的社会动力不仅仅是社会经济上的，而且是政治、军事和宗教方面的。在“科特迪瓦性”概念主导下，所谓“外人”判断标准已经族群化，出生地、文化和宗教归属等取代了此前的经济和社会标准，而成为了身份认同的首要标准，这意味着“外人”不仅包括外国移民，也包括广大的北方民众，从而出现地缘政治集团（北方针对南方）和群体（北方人

---

① John Akokpari, “‘You Don’t Belong Here’: Citizenship, the State and Africa’s Conflicts: Reflections on Ivory Coast” in Alfred Nhema & Tiyanbe Zeleza eds, *The Roots of African Conflicts: The Causes and Costs*, Ohio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88 – 105.

② Jeanne Tougara, “Ethnicity and Political Crisis in Côte d’Ivoire”,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2, No. 3, July 2001, pp. 63 – 72.

③ Richard Banégas, op. cit., p. 542.

针对南方人) 的严重对立。<sup>①</sup> 北方民众和外国移民成为了科特迪瓦危机的“替罪羊”。

2002 年, 巴博政府试图根据“科特迪瓦性”原则清洗军队, 引起反政府军的反叛, 这成为了内战的导火索。反政府军进攻阿比让和北方城市, 但被政府军击败, 随后退回北方。反政府军公开声称要推翻巴博政府, 举行不排斥任何一方的选举, 并恢复被遣散士兵职位。数支反政府武装合并成索罗 (Guillaume Soro) 领导的“新力量” (Forces Nouvelles) 武装。科特迪瓦分裂成了反政府军控制的北方和亲政府的南方, 巴博支持者屠杀居住在南部的北方人, 而北方反政府军也大肆屠杀南方人, 到 2003 年底超过 70 万人流离失所, 伤亡难以统计。<sup>②</sup> 自内战爆发后, 土著话语表现出强烈的仇外和极端民族主义倾向, 外国人和北方民众成为攻击目标, 索罗坦承反政府军主要是对 2000 年大选结果不满, 认为“科特迪瓦性”是彻头彻尾的仇外概念, 他们的兵变是对于政客文人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所鼓吹的针对北方民众的“意识形态变革” (Coup de force idéologique) 的一种反击。他们希望推翻巴博, 举行不排斥任何一方的选举, 从而确保北方人获得公民身份资格、平等参政, 以阻止北方人的边缘化。<sup>③</sup>

科特迪瓦危机爆发后, 包括联合国、非盟、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ECOWAS) 和法国等相关国际组织和国家的介入有效缓解了人道主义危机局势, 为南北和谈创造了条件, 但却未能从根本上消除科特迪瓦危机的根源。究其原因, 主要在于国际社会在斡旋时所用的停火、权力分享、裁军、人权和选举等典型手段<sup>④</sup>, 未能充分注意到公民身份和土著话语的重要性, 而这恰恰是科特迪瓦危机的核心问题, 因而导致一系列和平协议无法执行, 更是引发了 2010 年的大选危机。虽然危机最终以巴博被捕、瓦塔拉就任总统告终, 但是科特迪瓦仍面临着国家内部和解的严峻任务, 而无法由外部力量推行的。因此, 由科特迪瓦人自主推动的民族和解努力显得尤为重要, 这方面的典型是南北双方在 2007 年推动订立的《瓦加杜古协议》(Ouagadougou Agreement),

① Richard Banégas, op. cit., p. 541.

②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Côte d’Ivoire: ‘The War Is Not Yet Over’”, ICG Africa Report No. 72, ICG, New York, 28 November 2003.

③ Abu Bakarr Bah, op. cit., p. 604.

④ Andreas Mehler, “Peace and Power Sharing in Africa: A Not So Obvious Relationship”, *African Affairs*, Vol. 108, No. 432, 2009, pp. 453 - 473.

因为它明确针对关键的公民身份问题而提出修正机制。只有真正面对这一核心问题，才能从根本上消除科特迪瓦内乱的根源。

## 土著话语与非洲民族国家建构

继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内战以及几内亚比绍的政治暴力事件之后，科特迪瓦冲突进一步加剧了西非地区的动荡局势。值得注意的是，科特迪瓦危机与这些冲突有着明显差异，很难用非洲内战的“战争经济学”或者“失败国家”理论来解释。<sup>①</sup>科特迪瓦危机不只是权力斗争引发的，其关键在于公民身份纷争。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本土”与“外人”的区分已经成为科特迪瓦国内政治中的焦点话题，博瓦尼在40年统治时期内一直试图淡化公民身份问题，主张科特迪瓦“熔炉”的概念。然而，随着“科特迪瓦奇迹”的衰败，贝迪埃、巴博等继任者试图将公民身份问题政治化、极端化。瓦塔拉和巴博、北方和南方的分歧其实质是，究竟要坚持博瓦尼的理想化的族群融合、开放理念，还是要采取狭隘的、本土主义的族群政策。

科特迪瓦冲突的核心问题是“谁是真正的科特迪瓦人”，这是非洲普遍存在的“土著话语”的表现之一。所谓“土著话语”，即声称自身是某块土地（国家、城市或者村庄等）的原住民，代表口号是“大地之子”（Son of the soil），它以土地争夺、归属感（Belongingness）和认同等为表现形式，对于当代非洲发展造成巨大影响。囿于篇幅，本文仅举数例：

坦桑尼亚的移民政策近年来发生巨大变化。继50万卢旺达人在1996年被遣送回国后，亚裔群体也成为了排斥对象，有政客甚至提出“经济本土化”口号，要将经济控制权从“非本土坦桑尼亚人”转到“非洲裔坦桑尼亚人”手中。<sup>②</sup>

在津巴布韦，穆加贝政府声称“津巴布韦是津巴布韦人的”，号召发动针对白人的“第三次解放”（Third Chimrenga）。

---

① Paul Collier & Anke Hoefler, “Greed and Grievance in Civil War”, *Oxford Economic Papers*, Vol. 56, No. 4, 2004, pp. 563 - 95; William Reno, *Warlord Politics and African States*,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9; Ira William Zartman ed., *Collapsed States: The Disintegration and Restoration of Legitimate Authority*,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5.

② Ronald Aminzade, “From Race to Citizenship: the Indigenization Debate in Post - socialist Tanzania”,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Vol. 38, No. 1, 2003, pp. 43 - 63.

在赞比亚，政府和民众越来越敌视难民和外来移民，指责他们应为资源短缺和犯罪率上升负责，赞比亚当地报纸要求政府实施更为严厉的移民法，并认为赞比亚传统的热情好客是“软弱的标志”。

在南非，暴力仇外事件时常发生，最大规模的一次是在 2008 年 5 月，60 余名来自索马里、莫桑比克和津巴布韦的移民被杀，这使得南非“彩虹之国”的形象严重受损。<sup>①</sup>

在喀麦隆、莫桑比克和加纳等国，来自其他非洲国家的移民甚至被妖魔化为“生性怪癖的人”（Zombies）。<sup>②</sup>

过去 20 年间，很多非洲国家规范和约束公民身份和国籍的法律日益严格，尤其是针对少数族群和移民群体的。<sup>③</sup>

.....

类似的土著话语在博茨瓦纳、加蓬、刚果（金）、卢旺达和利比里亚等国也都有程度高低不一的表现。所有这些都表明，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在非洲政治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国籍公民身份（National Citizenship）概念，近年来有逐渐让位于“土著”观念的趋势，非洲国家独立初期曾经的包容性遭受侵蚀，而将特定社会群体排除在外，成为了非洲民族主义新的界定因素，新的民族问题似乎是“谁享有公民权但不配拥有，谁应该有公民权却并未享有。”<sup>④</sup>

土著话语更多是一个没有实际内涵的空洞、宽泛概念，而恰恰是这种空洞性（Emptiness）使其成为具有较强可塑性的话语。对于任何形式的身份认同都极为关键的“他者”概念，在土著话语这里可以很容易重新界定，从而适应全球化不断变动的界限。这与“族群”概念形成鲜明对比，“族群”概念需要具体的名称、历史以及语言，而土著话语并不需要这些，只需声称首先来到某块土地。因此，土著话语更难以捉摸，也更容易成为政治操纵的对

---

① Southern African Migration Project, *The Perfect Storm: the Realities of Xenophobia in Contemporary South Africa*, Cape Town: Southern African Migration Project, Migration Policy Series, No. 50, pp. 1, 5.

② Norbert Kersting, “New Nationalism and Xenophobia in Africa – A New Inclination?” *Africa Spectrum*, Vol. 44, No. 1, 2009, p. 11.

③ Stephen Jackson, “Of ‘Doubtful Nationality’: Political Manipulation of Citizenship in the D. R. Congo”, *Citizenship Studies*, Vol. 11, No. 5, 2007, pp. 481 – 500.

④ Cynthia Weber, “Designing Safe Citizens”, *Citizenship Studies*, Vol. 12, No. 2, April 2008, pp. 125 – 142.

象，它可以在从国家、城镇到村庄在内的任何层面以任何方式来建构“他者”。<sup>①</sup> 现以“科特迪瓦性”为例，它一般被视作科特迪瓦南方人针对北方人的，但也有学者强调，贝迪埃鼓吹“科特迪瓦性”概念，旨在强调自己的宝莱族的优越性，排斥目标不仅包括北方人及外来移民，而且还有其他的南方人。<sup>②</sup>

不过，土著话语虽允诺一种归属感，实际上却导致关于谁“真正”属于某地的激烈争论，这是土著话语之中所蕴含着的内在悖论。由于很难证明“首先”抵达某地，因此土著话语所带来的归属感是相对的、不牢靠的。而且，由于重新界定土著群体的趋势一直存在，这使得任何人都很难确保自身的土著性。在科特迪瓦案例中，土著概念实际上随着可可种植园范围的扩展而不断变化。可可生产最初是从东南部开始，逐渐扩展到西南部和西部，宝莱族也随之先后迁徙到东南部、西部和西南部地区，引起当地民众强烈的排斥情绪。尽管宝莱族自独立以来一直占据政府要职，并以南方人土著权利的捍卫者自居，但是他们也意识到，“真正”的土著可能在任何一刻将矛头对准他们。土著话语所带来的确定性只是一种幻觉，“你在睡觉时候还是土著，但是醒来发现自己已经变成了外人。”<sup>③</sup>

关于土著话语的兴起，概括起来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第一，归因于政治民主化因素。在西方捐助国的推动以及非洲国家内部压力之下，非洲各国政府纷纷实行私有化、多党竞争、自由选举和地方分权（decentralization）等改革措施。随着政治空间的开放，公民身份问题被提上日程，“谁有选举权”、“他们能在哪里投票”、“谁能作为选举人”等问题随之成为非洲国家政治中的焦点话题。土著话语的重要性日益显现，“政治自由化导致归属政治（Politics of belonging）的加剧：关于谁属于哪里的激烈讨论，对于‘外来人’（甚至是那些有着同样国籍，在此地居住了数代的人）的强

① 因此，本文所讨论的“土著话语”问题，与国内学界关注较多的“族群”、“部族主义”或者“地方民族主义”等概念既有相通性，也存在着明显差异。相关研究参见刘鸿武等：《从部族社会到民族国家——尼日利亚国家发展史纲》，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李安山著：《非洲民族主义研究》，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4年版。

② Bambi Ceuppens & Peter Geschiere, “Autochthony: Local or Global? New Modes in the Struggle over Citizenship and Belonging in Africa and Europe.”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Vol. 34, 2005, p. 394.

③ Peter Geschiere & Stephen Jackson, “Autochthony and the Crisis of Citizenship: Democratization, Decentraliz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Belonging”, *African Studies Review*, Vol. 49, No. 2, 2006, p. 6.

烈排斥,以及将祖籍地作为公民身份归属标准的倾向。”<sup>①</sup>在一党制时期,很多非洲国家积极鼓励外来移民参政议政。然而,随着向民主制的转变,将外来移民融入体系的动力逐渐减弱,“外国人”标签在多党竞争环境下常被用作政治竞争手段。在科特迪瓦的案例中,博瓦尼之后的3位领导人,贝迪埃、盖伊和巴博都运用“科特迪瓦性”概念作为政治策略,而瓦塔拉也将自己塑造成“科特迪瓦性”概念受害者以博取北方民众的支持。

第二,新世袭主义国家面临危机。虽然“新世袭主义”<sup>②</sup>(Neopatrimonialism)概念及其适用性近年来受到质疑,但大体概括了后殖民时代非洲国家的普遍特征,因而为学者们所普遍接受。在殖民统治刚刚结束的时代,很多非洲国家的新世袭统治体系较为稳固,例如刚果(金)、肯尼亚、塞拉利昂、马拉维和科特迪瓦等。近几十年来,西方捐助国所积极推动的经济结构调整政策导致非洲国家政府权力的严重萎缩,再加上非洲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持续边缘化,使得新世袭主义统治方式难以为继,恩庇关系赖以存在的基础也大大削弱,结果出现了统治精英合法性危机以及现有国家体系的破产,新世袭主义所提供的确定性逐渐崩溃。非洲各国领导人不再像以前那样能够通过分配国家资源来换取政治忠诚,因此他们在政治和经济资源争夺中日益运用土著话语来排除竞争者。

第三,年轻人和其他社会群体的边缘化。随着新世袭主义体系逐渐崩溃,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经济、政治和社会上趋于边缘化。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加入武装部队和民兵组织不仅是生存手段,更是一种生产和财富积累方式,他们因而深深卷入到由土著话语所引发的暴力之中。<sup>③</sup>在科特迪瓦危机中,年轻人是巴博政府的重要支持力量。他们在城市中组建亲政府民兵力量,负责搜查反对派,而在农村地区,“乡村爱国青年”在地方显贵们的鼓动下以“传统”的捍卫者自居,制造恐怖气氛,驱赶包括北方人、布基纳法索人在内的

---

① Peter Geschiere & Francis Nyamnjoh, “Capitalism and Autochthony: the Seesaw of Mobility and Belonging”, *Public Culture*, Vol. 12, No. 2, 2000, p. 423.

② 新世袭主义是一种混合类型的统治方式,其基本特征是公共与私人领域未能实现分离,因而造成法律理性(legal rational)和世袭观念(patrimonial)共存的局面,新世袭主义的维系有赖于政治精英通过恩庇关系实现资源垂直分配的能力。See Anne Pitcher et. al, “Rethinking Patrimonialism and Neopatrimonialism in Africa”, *African Studies Review*, Vol. 52, No. 1, April 2009, pp. 125 - 56.

③ Morten Bøås & Anne Haløy, “Getting in, Getting Out: Militia Membership and Prospects for Re-integration in Post-war Liberia”,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Vol. 46, No. 1, 2008, pp. 33 - 55.

所有外来人，甚至包括本地的宝莱族。<sup>①</sup>

第四，民族国家在全球化时代所面临的危机与挑战。从全球化进程的视角来看，全球化所带来的资本、商品和移民的加速流动，特别是移民和难民的大量涌入，对于当地经济关系、土地制度和文化习俗都造成了巨大冲击，加剧了民众的不安全感和焦虑，使他们更加在意公民身份和身份归属问题，由此导致通过仇外排外来建构界限和差异的现象日益增多，“流动性（Mobility）和固化（Fixing）这二者之间的拉锯战是近年来土著运动和暴力事件出现的重要背景。”<sup>②</sup> 全球化似乎成为了土著话语滋生的温床，与全球化开放相伴的是以排外和身份归属界定为表现形式的制造界限和封闭的努力。

总之，土著话语本质上是一个空洞、宽泛的概念，很容易成为应对全球化流动的手段和资源，但由于它自身的空洞性特点决定了它所承诺的归属感也是虚幻的，容易导致更大程度的纷争和不安全感。由于土著话语的这一内在悖论，使得它更多导致社会的分裂，进而影响到非洲民族国家建构进程，科特迪瓦危机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 结 语

博瓦尼在独立之后的长期统治时期，继续坚持法国殖民者的做法，在公民身份界定上故意采取一种模糊、含混的态度，这在促进经济增长繁荣的同时，也为此后的发展埋下了祸患。在多党制的政治环境中，模糊的公民身份导致土著话语的兴起，并进而引发了严重的暴力冲突和南北分裂。许多非洲国家也程度或高或低地出现类似的情况，这表明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在非洲政治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国籍公民身份概念，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有逐渐让位于“土著”观念的趋势，独立初期曾经存在的包容性遭受挑战，而将特定社会群体排除在外，这成为了界定民族主义的新因素，这时的民族主义主要针对本国国内的“外人”，而不再像是非殖民化时期那样针对的是外部殖民统治力量。土著话语的兴起印证了非洲民族主义先驱人物法农（Frantz Fanon）就后殖民时代非洲民族主义的演进轨迹所作的预判：“民族主义在先，接

<sup>①</sup> R Marshall - Fratani, op. cit., p 31.

<sup>②</sup> Peter Geschiere & Francis Nyamnjoh, op. cit., p. 444.

着是极端民族主义，然后是沙文主义，最后是种族主义”<sup>①</sup>，民族国家建构仍将是包括科特迪瓦在内的非洲民族国家面临的核心问题之一。

## Autochthony and Nation – state Building in Africa: A Case Study on Côte d’Ivoire Crisis

*Li Pengtao*

**Abstract:** The recent Ivorian crisis is largely driven by political and social grievances over citizenship, with the “Ivoirité” notion at the center of crisis. During Houphouët – Boigny’s presidency, he deliberately played down the importance of citizenship issue, so as to assimilate migrant workers and to keep economic growth and social stability. However, with economic decadence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multiparty politics in the 1990s, President Bédié created the destructive “Ivoirité” notion so as to exclude the northerners and to consolidate power, which finally leads to the outbreak of civil war in 2002. Similar autochthony discourse also emerges in other African countries, which reflects the complicity and difficulty of nation – building process in Africa.

**Key Words:** African Politics; Nation – state Building; Côte d’Ivoire; Autochthony

(责任编辑：詹世明 责任校对：樊小红)

---

<sup>①</sup> Frantz Fanon,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New York: Grove, 1968/1990, p. 125.